

■■■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性别平等与中国经济转型： 非正规就业与家庭照料

Gender Equality and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Care Provision

〔加〕董晓媛 〔英〕沙林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D669.68
35

性别平等与中国经济转型： 非正规就业与家庭照料

Gender Equality and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Care Provision

〔加〕董晓媛 〔英〕沙林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责任编辑：周秀霞 黄锦珍
责任校对：张长松 郑淑艳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平等与中国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家庭照料/（加）董晓媛，（英）沙林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 - 7 - 5058 - 9342 - 9

I. ①性… II. ①董… ②沙… III. ①经济改革 - 影响 - 女性 - 社会地位 - 中国 - 文集 IV. ①D669.6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9626 号

性别平等与中国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家庭照料

〔加〕董晓媛 〔英〕沙 林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京鲁印刷厂印装

690×990 16 开 18.5 印张 320000 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342 - 9 定价：4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性别主流化：一个有挑战性的社会理念的可能和局限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主席 巴巴拉·厄姆赛格 1

绪论 女性在家庭和市场的工作：不被承认、无报酬和研究不足

[加] 董晓媛 [英] 沙 林 8

上篇 非正规就业与性别平等

非正规就业与性别差异：中国劳动力市场转轨中的挑战

[英] 沙 林 27

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与性别特征分析

[中] 袁 霓 [英] 沙 林 48

非正规就业者和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中] 邢曲恒 69

非正规工作是否正在成为女性的工作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重构对女性就业和福利的影响

[英] 沙 林 [中] 王美艳 89

关于上海市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案例分析

[中] 王菊香 [中] 司 敏 [中] 陈月新 113

下篇 家庭照料与性别平等

照顾劳动、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加] 董晓媛 129

从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看公共政策的改革与完善

[中] 刘伯红 [中] 张永英 [中] 李亚妮 142

转轨期女性劳动参与和儿童看护选择行为的经验研究：

以中国城镇为例

[中] 杜凤莲 [加] 董晓媛 173

进城农民工家庭母亲就业与学前儿童看护选择行为的经验研究：

以北京为例

[中] 范会娜 192

照料父母对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中] 刘 岚 [加] 董晓媛 206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幼儿照料对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中] 王 恒 [加] 董晓媛 228

中国农村地区母亲劳动供给、非父母照料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中] 刘 靖 [加] 董晓媛 242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留守家庭成员时间分配的影响

[中] 杨红琴 [加] 董晓媛 267

CONTENTS

Forward: Gender Mainstreaming: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a Radical Social Concept

Barbara Unmüssig 1

Introduction: Women's Work at Home and in the Market: Unrecognized, Unpaid and Under-researched

Dong Xiao yuan Sarah Cook 8

Part I: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equality: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Labor Market Restructuring

Sarah Cook 27

Gender Pattern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Urban China

Yuan Ni Sarah Cook 48

Earning Gaps between the Informal and the Formal Sectors in Urban China

Deng Quheng 69

Feminization of Informal Employment—The Impacts of Urban Labor Market Restructuring on Women's Work and Welfare

Sarah Cook Wang Meiyun 89

Domestic Workers' Access to Social Security in Shanghai: a Case Study

Wang Jufen Si Min Chen Yuexin 113

Part II: Care Provision and Gender Equality

Care Provis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A Feminist Economic Perspective

Dong Xiao yuan 129

Work-Family Balance: Public Policy Reform and Development

Liu Bohong Zhang Yongying Li Yan 142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Child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Du Fenglian Dong Xiao yuan 173

Migrant Family's Choices of Mother's Employment and Childca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eijing

Yuan Huina 192

Parental Care and Married Women's Labor Supply in Urban China

Liu Lan Dong Xiao yuan 206

Childcare Provision an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Off-Farm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Low-Income Rural Areas

Wang Heng Dong Xiao yuan 228

The Impacts of Maternal Labor Supply and Non-parental Care on Children's Health in Rural China

Liu Jing Dong Xiao yuan 242

Labor Migration and Time Use of the Left-Behind Married Women, Elderly a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Chang Hongqin Dong Xiao yuan 267

性别主流化：一个有挑战性的社会理念的可能和局限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主席

巴巴拉·厄姆赛格 (Barbara Unmüssig)

一、性别主流化：一个激进的想法

性别主流化，其核心，是为实现两性平等和机会均等的激进的社会政治概念。

为什么是激进的？性别主流化是一种战略方法，它起初要求政府，进而要求企业和其他机构，将以性别为导向的观点系统性地引入到每一个政治和经济决策中。这是非常激进的想法，涉及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性别主流化试图用政治、政策和经济决策对不同性别产生的效果来审查和分析这些决策。通过这种方式，性别主流化终于消灭了性别中立的神话。性别中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政治决策，以及所有经济和商业决策和措施都对两性及两性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任何部门——无论是税收或其他财政政策、外交或安全政策、劳动力市场或医疗政策——都不能免于这种类型的性别分析。

二、性别主流化的起源是什么

最初，性别主流化概念起源于妇女政策与发展政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关于妇女问题的世界会议上。在此背景下，妇女们得出结论，要实现两性平等和机会均等，不能仅仅借助于妇女政策和家庭政策，这些概念的要素必须要纳入政治的各个领域，因此，就产生了“主流化”这一术语。主流化意味着要融入大部分结构中，因此，它

不啻将这种性别政策作为一个交点，引入所有的政治领域。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标志着一个里程碑——国际妇女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无数国家引发了关于提高两性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倡议。《北京行动纲要》不仅将性别主流化纳入其中，而且也是第一份包含性别范畴的文件。因此，《北京行动纲要》是第一份力求界定这一概念的国际文件。

“性别”的范畴是什么？首先，“性别”是什么？在各个社会里，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蕴藏在相关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中。这就明确说明，性别角色取决于社会，是社会和文化决定的。同时，也意识到，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产生了，于是社会变革就产生了。这明显表示，特别是对妇女和女权运动人士而言，她们能够影响两性之间的关系。我们绝不能接受性别角色的现状。相反，我们可以积极地影响和改变现状。这些想法与《北京行动纲要》一起，在国际上取得了突破。

在北京取得的另一个重要胜利，就是使这样一个事实形成了规范，即改变两性不平等和不民主现状不单单只与女性有关，而且也与男性有关，这是整个社会的任务。希望改变两性间关系的人必须得到男性的配合。事实上，他们需要动员整个社会。日益明晰的是，两性平等政策——作为核心宣言——不能仅是妇女和妇女组织的目标，而且必须同时是男性的目标。

三、12 年间发生的与性别主流化观点相关的事件

首先，根据记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性别平等的政策在全世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妇女政策和性别政策的制度化一贯是国际妇女运动及妇女网络政治要求的核心之一。《北京行动纲要》和性别主流化原则非常支持制度化的做法，它要求各国政府为实施性别主流化重新配置必要的体制、财政和人力资源。由此，《北京行动纲要》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推动政治举措，改善世界上许多国家关于妇女平等的法律框架。

然而，尽管已经取得了这些毋庸置疑的进步——从世界范围来看——两性之间的等级制度、权力差异和支配条件尚未废除。

对于遍布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来说，歧视、不利条件和暴力仍然是生活状况的决定性元素。目前，凡是涉及此事的任何国际文件和国际（妇女）会议都证实，在许多社会里，两性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有可能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妇女仍经常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她们的法律地位岌岌可危。妇女感受到的经济差距几乎没有缩小，尽管她们获得有报

酬的就业机会会有所增加——一般而言，与以前相比，她们比男人更有可能面对危险的工作条件、从事兼职工作以及从事报酬低廉的行业。然而，男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受到失业、暴力和边缘化的影响。

然而，可以明确地说，20 世纪 90 年代全世界关于性别主流化的法律规章开始建立，值得肯定。《北京行动纲要》和 CEDAW（《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联合国公约都是重要的政治框架，为呼吁和诉求性别平等的政策打下了基础。

例如，在欧盟，由于已经通过了众多的性别平等倡议，因此有些人称之为性别平等政策的“黄金时代”。其中，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就是一个例子，该《条约》规定，性别主流化原则是欧盟所有成员国的职责。它还强制要求所有成员国和所有欧洲团体在制定各级政策时都必须考虑性别观点和性别分析，从而在决策制定的各个阶段都关注性别。欧盟制定了一个为期 5 年的路线图，确定了优先执行性别主流化的核心政治领域。以目前的行动计划《2006 ~ 2010 年路线图》为例，这些核心领域包括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男女要实现平等。后者则特别强调各国要提供适当的服务，使家庭和事业能够协调，照料家庭与料理事业能相容。

除此之外，欧盟的这一路线图还包括，建议每个国家接受倡议，并创造必要条件以帮助克服传统的性别成见。它要求一些国家，如德国、波兰、奥地利和意大利，做得更多——创立性别培训，编纂工作手册，并提供许多其他形式的支持。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而且，性别主流化的概念和原则实际上已经在许多机构和行政部门中，以及在加深学习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

四、制度的学习

只要存在落实它的政治意愿，性别主流化就可以发挥不少积极的作用。官僚机构是否被要求必须使用性别主流化的原则考察其政治决策在性别层面的影响，这一点将导致巨大的差异。这本身就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它可以改变各种机构对性别的意识。性别主流化要求人们增加的对性别的认识。通常，人们对于政治决策如何影响性别关系的了解很少，或几乎没有。世界各地收集的大多数统计数据都是性别中立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收集按照性别区分的数据。使用性别主流化的原则，人们已经在创造这样的知识，并成功收集了相应的数据。这让人们意识到，对于医疗政策、医疗方法等方面，女性和男性感受到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

现在，新的工具和方法，如性别分析或性别预算编制，让人们对于公共政策引起的与性别相关的后果，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见解和看法，并建立起针对政策和管理的新知识标准。

如果存在提供财政和人力资源的政治意愿，那么性别主流化将开启变革的历程，启动意识提升的过程，并使制度的学习成为可能。这些都能引起新的行动以及新的行政行为。关于性别主流化能产生的众多积极影响，有许多正面的例子，特别是在欧洲。

五、性别主流化的限制

1. 缺乏政治意愿

接下来，还有几个关键点需要阐明。

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性别—政治有了觉醒，可概括如下：性别从未如此受到重视。每个人都被强迫采取行动，按性别主流化的原则运作。由于欧盟采用了这一原则，所以它成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参考框架，以推动无性别歧视的国家政策，尤其是对欧盟新成员，如波兰。

但是，进入新千年以来，人们陷入了性别—平等的政治僵局。这包括德国，作者在后面会详述。陷于僵局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有几个总体的政治原因。欧盟成员国已经从15个增至27个，从而导致多数一方发生了变化。此外，欧盟的各国政府内部出现了变化，比如在德国保守党派就掌握了实权。这些保守的欧盟成员国政府试图淡化改革目标和犹豫不决、三心二意地执行欧盟关于两性平等的政策。在许多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公开讨论中强调了相当保守的性别角色。在一些国家，如波兰，反同性恋和仇外态度已越来越突出，这也使人们难以将性取向、种族和文化等内容作为歧视性因素公开讨论。整体而言，现在的环境更加敌视反歧视辩论，也更加敌视讨论两性平等政策。

使两性平等陷入政治停滞的第二个原因是：两性平等的政治方法太过注重，甚至于几乎完全针对家庭和事业的兼容性。这使它们附属于家庭政策，甚至完全被家庭政策取代。

另一方面，在德国看到不少现象。乌尔苏拉·冯·德·赖恩，联邦家庭事务和妇女部长——一名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成员——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全国范围内为养育儿童筹集到了更多的资金和基础设施。这表明，保守派的政治家也可以发起和推动现代化，至少在家庭事务政策方面。但是在德国，除了家庭事务政策和关于调和家庭需要

与职业发展的讨论之外，现任政府几乎没有做出其他额外的努力，来促进两性的政治平等。事实上，目前德国政府正在解除几乎所有促进性别主流化的行动方案。本应在政府各部门间协调性别主流化活动的一个指导委员会，已不复存在——它已被废除。提升女性地位的政策很少为公众所见，即使有，也大多集中于女性的职业发展。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国家、欧盟或联合国层面，有关提高女性地位的预算方案正在被废除或削减。

事实上，现在缺乏去真正抓住性别主流化的激进核心并考察政治决策产生的性别—政治后果的政治意愿。在日常政治事务中，性别主流化是几乎从来没有被实施，不论是在政府和机构内，还是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除了几个试点和展示项目之外，这一工具从来没有被真正使用过。性别主流化需要在国家层面重新纳入政治讨论，特别是在多数欧盟成员国。

2. 概念的局限

除了这些潜在的政治条件和缺乏政治意愿，也存在可能妨碍过并将继续妨碍性别主流化取得成功的其他因素，其中特别包括实现它所使用的方法。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性别主流化是不是一个良好、积极的工具，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两性平等和打破性别层级，存在不同的看法。在作者看来，这一本来激进的概念，尤其被一些机构以及一定程度上被妇女组织定义得过于狭隘，解读得过于政治化。人们没有成功地将两性平等政策纳入重要的、所谓硬性的政治领域，如经济和劳动力的政策，养老金计划和社会政策，并促使这一话题得到公开讨论。

在欧盟，结构基金和欧盟区域计划确定着社会经济政策的方向，在欧盟贫困地区投资大量资金；如果使用性别主流化的原则分析它们，看看它们受到性别政策怎样的影响，将很有启发性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在这些相关的经济决策和进程中，性别主流化绝对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人们总是非常强调机构的作用，但却排除了对性别关系起到直接和重要作用的经济领域及经济决策，人们完全忽视了它们。例如，在德国——摒弃了性别主流化——最近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在福利金方面提高了男女对彼此性别的相互依存度。对于诸如男女均应在满足基本需求方面保持自主的要求来说，这是一个倒退，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

性别主流化并未成功地干预大型的政策领域以及重要的决策过程。在德国，其实仅有一些试点项目。试点项目已到处开花，让性别主流化的想法得到“试水”，但从未超越过这个阶段。上任德国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政府委托进行了一项针对性别预算编制的可行性研究专题。按照性别标准审查预算，将是性别角度影响政府决策的真正突破。起初，政府甚至不愿

意公布这项研究的结果。后来，主要是妇女运用公众的压力，促使政府公布了研究结果，现在联邦政府已经把该项研究放到因特网上。然而，政府拒绝进行任何政治协商，不愿讨论如何在德国城市和联邦进行性别预算编制。这显然是由于政治风险太大了，因为决策的各个步骤都需要改革，而这种风险不仅仅来自性别一政治观点。

第二点批评是，过于片面地注重机构体制。要付诸行动，政府部门、世界银行、市政府和企业等机构的决策者，必须要有决心去执行性别平等政策，并且创造更多两性平等的机会，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样，自上而下的方法是成功实施性别主流化的一个核心的先决条件。

然而，机构和公司的行动并非中立的。他们行动的领域也受到控制和自我利益的制约。机构也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像政府和所有其他组织一样。商业企业早已发现，女性是一种经济因素，并支持性别主流化和这一方向的多样性进程。他们只将女性作为一种经济因素，并不太关心性别等级和性别角色。

很多时候，人们表现得好像可以告诉这些机构该做什么，而忘记了，这些机构反映了整个社会权力和统治的架构，从而也反映了关于性别角色的普遍看法。谁来界定某种传统的性别角色是什么？谁来界定什么是“对女性公平的”和“对男性公平的”？谁来阐明需要和目标，更重要的是，用怎样的谈判权力？谁有权确定本机构内的这些事宜？

机构和官僚体系当然不是对性别考虑本身非常敏感的领域。同时，决策结构和实践仍保持着层级结构，企业文化往往仍以“老男孩网络”为特色。主导它们的规则和制度，更多的是建立在保密的基础上，而不是面向增加透明度和公开辩论的文化。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政府官僚部门和其他机构中的性别主流化试点项目更多地产生了手册、标准和清单，而且这些过程，特别是在开始时，往往就是技术官僚性质的。

如果不想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很显然，机构可以促进学习的过程。诚然，我们需要运作良好的机构，施行包括解放妇女在内的政治理念。但是，这是作者的一个基本论断——人们还需要来自草根的全社会行动，需要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压力，迫使这些机构转变。只有对变革的诉求明确来自于整个社会时，政治决策才会在本质上改变。只有到那时，机构才会贯彻具体的政治和政策规范。作者认为，许多曾相信或仍相信机构曾能够或将能够理顺这些关系的人，不知何故都忽略了这种关联。通过游说影响机构和官僚体系是一方面。借助媒体和广大公众，通过嘈杂的抗议，组织起全社会的压力，又是另一方面。

仅仅专注于通过性别主流化工具影响机构的两性平等政策，已经遭受到巨大的政治阻力。如果妇女组织或性别—政治组织不具备谈判能力，不能从外部影响各国议会和公众舆论，从而也无法间接影响机构，那么这一情形将更加突出。在许多国家，促进两性平等则取得了成功。无论是在南非、肯尼亚、墨西哥，还是在巴西，妇女政治组织能够利用某些过渡阶段的政治突变，成功地引入《北京行动纲要》的性别主流化原则。归根结底，在所有国家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如何在社会中组织性别政治议题。

最后，许多人知道这是另一个问题——某些机构已滥用性别主流化的概念，阻止资助妇女的其他政治举措。可以说，性别主流化被当作停止资助其他妇女项目的借口，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现在通过性别主流化来应对性别问题。”这一直是政治和其他机构利用的一个灾难性的借口。从一开始，性别主流化就明确指出，需要两方面努力：既需要加强和促进妇女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同时又需要让男性参与性别—政治问题。事实上，妇女项目已经下降到了次要位置，不但没能强化这些理念，反而削弱了它们。全世界针对性别主流化存在大量的异议和批评。出于多种原因，这个想法在实际政治的应用也已经丧失了其激进的核心。

六、结 论

性别主流化明显仍然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概念。如果它能得到严肃对待，并且真正成功地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的政治决策，那将是在追求两性平等和公平方面的一个突破，而且在我看来，还将带来完全不同的政策和政治，需要将性别观点纳入税收、外交、安全和劳工政策等领域。问题是，人们太过专注于在机构内部运用技巧性和官僚体制的解决方案。为了使性别政策再次成为全社会、而不仅仅是专业人士讨论的话题，社会各界仍需继续努力。必须在全社会传播两性平等的理念，必须自下而上组织起更多的政治压力。除了两性平等政策（包括性别主流化）之外，欧盟内部仍然存在许多工具，可作为国家政策非常重要的参照标准。在欧盟许多国家倡导两性平等的人应该感到幸运的是，欧盟已具备了迫使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的指令。可以确信，没有理由降低期望，人们需要这种框架。但除了这一法律框架外，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政策，贯彻关于平等的倡议，而且还需要更多男性的帮助。社会需要榜样，需要愿意在全社会倡导两性平等的男性榜样，包括在政府、各行业和工会组织中。要从根本上改变两性间的关系，仅仅依靠女性的努力工作是远远不够的。

绪论

女性在家庭和市场的工作：不被承认、无报酬和研究不足

[加] 董晓媛 [英] 沙 林

一、引言

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的。经济改革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将这个几乎对外资和国际贸易完全封闭、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贫穷农业国，转变成了一个贫困大幅度减少、收入显著提高、相当开放及全球化的经济强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世界工厂”，全球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并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来源。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的是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迁。市场和非市场领域商品和劳动力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国家和工作单位作为社会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被侵蚀，从而使得家庭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由国家承担部分社会再生产和照顾的责任又转回到了家庭。这些变化对于妇女在家庭和市场工作和地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人们对于在转型过程中男女的不同遭遇还知之甚少。改革之初，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很高，在工作场所相对许多其他国家取得了较高的性别平等。但是，妇女地位的提高却伴随着劳动分配制度的效率低下和企业存在大量的冗员。大量关于改革时代的经济文献着重于分析市场分配机制的扩展和在什么程度上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相对来说，只有一小部分文献研究了经济改革在劳动力参与，就业和工资率等方面对

男性和女性影响的性别差异。^①

本专集试图通过关注两个关键但却被忽视的领域来扩大人们对于经济改革对妇女地位影响的了解。第一，面对在“正规”企业就业的人数在总就业人数比例中不断下降，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在争取这样的工作时的遭遇如何？她们是不是被推向边缘？推向在不断增长的更加弹性、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这种变化产生了何种影响？第二，经济改革对非市场活动，特别是传统意识中认为应有女性从事的照顾孩子、老人和病人等活动的影响是什么？这种照顾的责任如何影响女性的就业和工资？还有，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对妇女及其家庭的福利有什么影响？在非正规部门的工作和家务劳动在女性总工作时间中占有重要份额。这些工作大多是低薪或无薪，并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官方统计，也未被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们所承认。

二、分析女性工作的理论框架

社会性别的视角为理解社会分层的模式和原因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性别，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分层器，是大多数社会中基本劳动分工，也就是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分工的基础。生产活动，是指创造收入的活动，大部分与市场相联系。再生产活动包括无薪酬的照顾和促进人的发展的活动，比如照顾老人、孩子、病人和残疾人（Cagatay, Elson and Grown, 1995）。无偿照顾活动是一种工作，尽管它们不是以市场为导向。在大多数社会中，妇女不仅承担绝大部分再生产活动而且还要从事生产活动。

无偿的照顾活动对人们能力的发展和福利至关重要，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照料这种活动对推动和保持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Folbre and Nelson, 2000）。但是，经济制度的运作通常是假定照顾他人是女性的职责，而不承认她们对社会再生产活动的贡献（Elson, 1999）。无偿照顾活动不被视为经济活动，因此不被计入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统计（Beneria, 2003）。相反，家庭责任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地位，并且是她们在职场和收入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因素。生育和抚养孩子中断了妇女的劳动力参与，这种间断性的劳动参与降低了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她

^① 见贝瑞克、董晓媛、萨默菲尔德（Berik, Dong and Summerfield, 2007）关于性别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文献综述。

们的升职机会也渺茫（Mincer and Polachek, 1974; Jones and Makepeace, 1996; Royalty, 1998）。照顾的责任也使许多女性只能选择那些兼顾照料和有偿工作的职业，比如兼职工作和自雇佣（Becker, 1991; Polachek, 1980）。这些“非正规”的工作通常是不稳定的，并且常常被经济统计遗漏。由于雇主认为女人总是会为了家庭责任而中止工作，他们不愿雇用女性而且往往对女性制定比男性更严厉的晋升标准（Lazear and Rosen, 1990）。在雇用和晋升中的歧视做法加剧了性别隔离，使妇女被排挤到低工资、低技能的工作。对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花费时间和精力在再生产活动中的女性通常因为中断工作，减少劳动力供应和错过晋升而遭遇终生收入大幅减少（Waldforgel, 1998）。女性经济学家称因女性再生产角色导致的收入损失为“妈妈税赋”（Crittenden, 2001）。

社会政策和公共干预普遍认为女性面临的问题是私人问题，应由个人负责解决，很少注意到照顾家庭的责任对女性的经济、情感和健康的不良影响（Hooyman and Gonyea, 1999）。许多社会保障制度、福利的多少主要依据有报酬工作的参与，并且往往只针对正规部门的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造成了女性对男性亲属的依赖也限制了她们在年老时的选择。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一般很少关注其对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在再生产活动的影响（Elson, 1995）。20 世纪 80 年代的结构调整的研究证明性别盲视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阻碍了性别平等的实现（Elson, 1991; Elson and Cagatay, 2000）。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的性别分工是个人基于男性和女性比较优势的理性选择（Becker, 1991）。新古典主义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现象。和在市场中有有一技之长的配偶相比，女性通过无偿照顾行为积累的人力资本不能运用在市场中，这使得她们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在分居或离婚时在经济上更容易受到伤害。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没有意识到男女对资源配置的决策不是在真空中做出的，他们的决策受制于一个更加广泛的制度环境。^① 社会规范、经济体制和政策法规决定了男女选择的动机，机遇和制约条件。因此，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社会制度是性别不平等问题核心。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理解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的动态相互作用，经济和社会变化对性别的影响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

^①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指出，贝克尔家庭资源配置和歧视理论产生一个循环的论断：女性专门从事家务劳动因为她们的市场劳动报酬低，而她们市场劳动报酬低因为她们有家庭责任（Folbre, 2004）。